

走向川康民族地区的身体史研究

——邓杰著《医疗与布道：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地区的医疗布道活动》序

杨 天 宏

边疆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季曾经处于“显学”的重要地位。然而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属于传统学者治学的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从研究领域看，清季的边疆研究大致局限在边疆史地的范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包括医学史在内的自然科学史或身体史，则更是鲜有问津者。从方法上看，清季的边疆史地学者，大致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成果以游记杂录居多。可以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始于外国传教士、旅行者、外交官、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在中国边疆地区所作考察，其中法国天主教徒及英国基督徒投入的精力最多^①。

民国以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呈衰落之势，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则开始起步。边疆研究此时受到重视，一方面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西学”之“东渐”，导致学者在研究手段上的突破有关；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在此时加重，也刺激并促成了此项研究的发展^②。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府西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西移。一时间，大量学人荟萃西南一隅。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因抗战的缘故，成了“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后方，地位陡然提升，被政府及民间寄予厚望，受到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边疆研究亦因民族危机的刺激，由“隐”而“显”，成为热门学科^③。

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再度受到学者关注，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关研究蔚为大观。但无论近人还是今天的学者，对

于基督教所作医疗布道工作均缺乏研究，对于基督教在四川西部羌藏及西康彝族地区活动的研究更是远远谈不上具体深入。上个世纪40年代，李万方对既有边疆研究脱离边地实际的状况曾表示不满，称研究者仅仅是“坐在建昌研究”，或“站在大渡河那边大写其文章”，认为这种有类雾里看花的研究状况不改变，国人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边疆^④。

就基督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医疗布道活动的研究而言，状况也不容乐观，很多重要的领域长期无人涉足，相关成果几近空白。而教会在华医疗布道的历史，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至少从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立场上观察是如此。传教士贺夫曼（Dr. Hoffman）说过：“医药布道的目的，在于使人民看到医治疾病，有比较他们古老而迷信的办法更好的方法，使他们改正对于疾病与生活的错误观念与态度。”^⑤1838年，中华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在广州成立。这是新教传教士和外籍医生提倡的将医学与传教事业明确结合为一体的第一个全国性西医学机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医务传道会。100年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继承教会先驱的遗愿，深入川、康民族地区，开展服务边民的“社会福音”工作，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将西医、西药带到川、康边地，使当地200万民众受益，而医疗布道则是这场教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杰博士此项研究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完整重建了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在川、康边地医疗布道的历史，从教会医学史及宗教史研究的角度

度,丰富了既有的边疆研究。与涉及边疆民族及宗教的既有著作相比较,邓杰所做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够在西方教会医疗布道的宏观背景下观照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所作医疗布道工作。从历史研究的立场上看,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任何历史人物的出场都不是孤立的,一定会与众多事件及人物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深入川、康民族地区开始医疗布道工作,与教会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有关,又是基督教在中国寻求“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具体体现。如果不注意观照其联系,孤立地分析与叙事,会让人不得要领。反之,一旦把握住了边部活动在当时特定语境下的位置,不仅历史事件及人物本身能够活现在作者书写的文本之中,其内涵及意义也能够充分凸显。二是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既有学术研究状况。在这方面,邓杰博士所下功夫可谓不小,其著作不仅详尽评述了事件发生当时相关的历史记述,对于后人的研究也能全方位调查分析,明其得失利弊,实事求是地交代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相关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节点。

粗略统计,该书搜集利用的各类文献逾300种,其中档案资料的搜集功夫尤其到位,全书利用了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上海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以及阿坝州档案馆、汶川县档案馆、甘孜州档案馆、理县档案馆、西昌市档案馆所藏主要边部档案,可以说,但凡藏有边疆服务历史档案的档案机构,作者都已走遍。其他文献的利用也很到位。有些当时当事人留下的资料,如边疆服务部办的期刊《边疆服务》、《边疆服务研究》,以及教会在全国范围发行的《公报》、《协进》、《田家半月报》、《真光杂志》、《基督教丛刊》、《天风》、《真理与生命》及大量教外人士创办的报刊杂志,在邓博士的书中都得到充分的利用。这种史料搜集上近乎竭泽而渔的功夫,使分析论述立于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避免了时下普遍存在的貌似高深学术探讨实际上严重缺乏事实支撑的玄学似的无根之谈。

就形上层面的问题探讨而言,因为有翔实的事实材料支撑,两者呈现出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

局面。书中纯主观性的分析虽然不多,但却得其要领。在其著作中,作者着力讨论了西方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在川、康民族地区的初期传播与基督教福音传播的关系问题。作者发现,教会同时做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使自己处于吴义雄教授研究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早期活动时指陈的介于“宗教与世俗之间”^⑥的尴尬位置。教会内主张社会福音的“自由派”认为处于现代环境之中,以提供实际的利益来体现基督教福音乃教会的必由之路,而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基要派”则认为其取径离经叛道,希望回到传统的布道立场,反对教会去做在本质上与宗教不相干的事情。然而何为相干何为不相干本无定论,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地区的“医疗布道”活动于是处于在两条路线之间游移不定的状态。这种思想路线上的混乱与中华基督教会是一个标榜超越教派的诸派合一的教会组织有关,不同宗派的人因宗教上“本色化”的需求走到了一块,但思想主张的分歧终究是难以弥合的。

然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宗教界,自由派的思想路径毕竟相对主流,受其影响,边疆服务部尽管强调兼顾两者,却将主要精力用到近乎单纯的医疗卫生事业上。这给当地民众带来了诸多实惠。差不多与世隔绝的边民接触属于外来宗教的基督新教,经由的大多是这样的管道。这种看似缘木求鱼的布道手段,产生了教会人士未曾想到的布道效果,相对内地汉民族地区,至少在羌族、彝族地区,教会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拾回了此前因民族主义浪潮波及以及地震灾害而失去的在当地布道的“领地”。这种伴随着纯粹福音主义丧失而获得的实惠,对于教会究竟意味着什么,邓博士的研究虽未得出结论,却无疑给出了可供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的事实材料。

从纯粹医学史的角度观察,邓博士的研究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近年来,人类“身体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为历史学开拓了一个具有广阔探索空间和研究前景的领域。虽然疾病医疗史不等于身体史,就是史学界从社会史角度对疾病医疗的研究与身体史也有明显差异,但疾病医疗史与身体史之间存在的亲和力则是无法否认的。就学术现状而言,至少在国际中国史学

界,目前仅见的中国身体史研究者基本都是从探究疾病和医疗问题入手进而关注身体的^⑦。但迄今几乎所有中国近代疾病医疗卫生方面的研究,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和汉人身上,涉及川、康地区羌、彝、嘉戎等少数民族疾病身体史的系统研究,至少我本人尚未读到。邓杰博士的研究,对于亟亟探究身体史研究的趋新学者,提供了为其忽略的边疆民族区域史研究的事实参照,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就研究取径观察,现在标榜做“身体史”研究的国内学者偏重于揭示其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含义,很少进入纯粹医学史领域。边疆服务部曾对川、康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疾病展开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调查资料,为该地区少数民族身体史的重建提供了研究素材。像黑热病、回归热等传染病在该地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医学史的一项空白,对于该数种疾病在高山地区的防治,提供了病理学及药理学的依据。另外,边部医院诊所在将近 16 年的时间里诊治边民各种疾病留下的病情数据及治疗手段记录,亦可视为今日该地区发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参考依据。而边部所创建的从地区中心医院到星罗棋布于各主要村镇、学校的诊所,再到以定期巡诊方式派出的医疗队这一整套医疗体系及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为居住范围甚广且极为分散的边民提供了现代医学的制度性保障,对于国家在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邓杰博士以其学术慧眼,关注到了这一切,并通过长达数年的开创性工作,将许多对于身体史研究具有非同寻常价值的医学史素材,梳理出事实逻辑,展现在读者面前。

不过若求全责备,邓杰的著作还有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其主要不足为客观材料多而主观认知少,形下叙事多而形上分析少。历史研究之所以具有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简单还原历史,告诉今人其所未知的珍贵史实,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解释历史,厘清历史事件背后复杂的关联性,促使人们对表现于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却又可以上升到宏观社会发展层面的问题展开理性思

考。就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而言,造成其过去两个世纪悲剧性命运的原因以及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如何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现行政制与其母国截然不同的中国寻求其未来发展,就是应该在研究中深入发掘的问题。惜作者在这方面用力不够,这多少影响到了著作的思想及学术价值。但愿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这一问题,庶几达致更高的学术境界。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甘棠)

-
- ① 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徐益棠对此作了如下记述: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收藏之稿本及小册,数以百千计,即就安南河内之法国远东学院,已颇可观。盖自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之旅行我中华者,年有增加,归则录其所见闻者以成书,虽精审者少,然经政府以及学术团体之奖掖与提倡,其中已不乏高明之作,而尤以 1906 年前后为最发达,盖其时吾国国势凌替,列强正谋蚕食我边疆之会也。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 1 卷第 5、6 期,第 51 页。
 - ②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蒙藏委员会编印:《边疆通讯》第 4 卷第 4 期,第 1 页。
 - ③ 张伯怀:《服务运动之重要》,《边疆服务》第 2 期,1943 年 6 月,第 1—2 页。
 - ④ 李万方:《谈本部为宁属边民服务》,《边疆服务》第 4 期,1943 年 11 月,第 11 页。
 - ⑤ Dr. R. E. Hoffman, *Journal of the Christian Medical Assoc. of India, Burma and Ceylon, Efficiency in the Task of Medical Missions*, Jan. 1940. 转引自海珥玛著、何慈洪译:《基督教会的乡村工作》,广学会出版,1939 年 5 月初版,第 4 页。
 - ⑥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 3 月,第 291—318 页。
 - ⑦ 比如目前这一领域少数最有成就者之一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较早曾从事 18 世纪中国的分娩这一与医疗紧密相关问题的研究,当时,她完全是以社会史的主题与取向来形塑的,而后,她逐渐以月经和女性血液的文化建构为研究对象来探究身体本身的历史。费侠莉著、蒋竹山译:《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新史学》1999 年第 4 期,第 130 页。